



10天日本劫难

现代快报
特别报道

A02 A03 2011年3月20日 星期日 灾难当头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白天它是热闹的旅游景点，夜晚多半会被璀璨的灯光包围。10天前，东京塔是这样；可是自从3月11日下午发生9级特大地震以来，它变得暗淡起来。不只是东京塔，因为限电的缘故，整个东京的夜晚也变得暗淡无光。暗淡的也不仅仅是这些物质的灯光，在日本全境，无论是东北部灾区，还是东京、大阪，到处都可以体现出一种暗淡的氛围和心情。

今天是大地震发生以来的第10天，虽然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虽然表面上看，至少在东京，人们表现得依然从容、淡定，秩序井然，但是如此大的灾难，不仅仅是地震，还包括地震引发的海啸，更要命的是前景不明的核威胁，都给日本以沉重的一击。

值此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此次灾难远没有过去的第10天来临之际，快报记者连线在日本的中国人——留学生、定居者、旅游公司职员、媒体人，试图以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视角来定格这一特殊的时刻，真实地展现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处在艰难境地的异国他乡。

□快报记者 毛丽萍 倪宁宁

电车时断时续，他们就安静地坐公交，骑单车
食品和饮用水短缺，他们就安静地在超市排起长队
媒体呼吁捐款，他们就安静地往指定的账号打款
政府要求节电，他们就主动关闭了货架上的灯
他们是谁？他们是大灾之后安静的日本公众

日本浩劫 震惊世界的10天

强震、海啸、核泄漏 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感同身受

3月11日下午2点46分 灾难来敲门时，不会落下任何一扇门

东京 楼晃得人头晕

3月11日下午2点46分，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把时间分得那么细致，但是在此之后，差不多所有的人，特别是生活在日本的人们，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等，都会记住这一时刻，并且一生难忘。不为别的，只因这一时刻，生死相隔只有一线。那一刻的地震，以及引发的海啸，估计在震中的沿海地区，已经致伤7000多人失去了生命。而对于身处震中之外的人们，那一刻给他们带来的惊吓，即便过去了10天、1年，或者更长时间，也会让他们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3月11日，周五，工作日，东京，从事软件开发的工程师崔光哲因为孩子发烧，向公司请了一天假。那天下午，地震来临的时候，他正在睡觉。“我老婆把我叫醒了，说地震了。”崔光哲说因为前一天晚上照顾生病的孩子没睡几个小时，特别困，而地震在日本是常事，所以被叫醒的他还有点生气。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可不是一般的地震”。

“刚开始还行，但后来房子晃得越来越厉害，我看看电视要被晃倒了，就跑去扶一下；窗外的电线杆晃的角度很大，电线也是。”在崔光哲的印象里，这种剧烈的摇晃至少持续了20分钟以上。摇晃停止后，他走到别的房间，看见浴室地上放的一盆水全泼出来了，流得走廊里到处都是；厨房的柜门被震开，东西都掉在了地上。

地震来临之前，在东京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中国留学生陶然正在电脑前查看数据。陶然是南京人，法国国立应用科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学生，去年暑假作为交换生到东京大学读大四。每年的2、3月份，日本大学放春假，但是东京大学还是有一些实验室对学生开放。实验室楼有12层，陶然的实验室在7楼。

“一开始就是摇晃，接着电脑从桌上‘摔’下去，抽屉不停地开、合。”见日本同学往桌子底下躲，陶然和几个中国同学也开始钻桌肚。摇晃停止后，有教授赶到实验室，让大家走楼梯到学

校大讲堂前的空地去避一避。很快，空地上就聚满了人。

地震来临，如果来不及到空地逃生，钻到结实的桌子底下差不多是最好的选择。还是在东京，来自南京的留学生小李，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我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处理方法。”地震过后，他发现家中好多东西都被震乱了，煤气也自动停止了（为了防止火灾和爆炸）。他按了复位键又恢复正常。“因为学校教过防震措施，所以说当时还是比较冷静的，毕竟以前也碰到过类似情况。”小李说。

而上面这些描述，也差不多是生活在东京的人们共同经历。

还是在东京。胡朝，舜天国际海外旅游赴日旅游团的一个领队，已当了十几年的导游，3月11日那天，她正带队在东京游玩。日本时间下午2:40左右，东京最著名的浅草寺，离团队集合时间还有20分钟，之后行程去银座购物街。地接带一个与团队走散的重庆游客打联络电话，地抖动了一下，地接叫了一声地震。随后很快就听到寺庙佛塔铜铃乱响，佛殿里面的游客蜂拥着跑出来，大家簇拥在一起，躲开建筑物和大树。远处的高楼左右摇晃，居然没有倒，由直线变曲线，再由曲线变直线，像风中摇曳的草。胡朝赶紧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都没少，“心中踏实了一点，大家不敢离开，等待着后面余震来临，每隔一段时间一次。”

仙台 重灾区，但房子很结实

日本东北部的宫城县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仙台市是宫城县的首府。在中国，仙台因为鲁迅而闻名，在毛笔作刀枪前，年轻的他在仙台学医。

3月11日下午，范泽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日交换生）正在仙台东北大学国际交流会馆的一楼大厅内弹钢琴，“都是那种练习曲，一楼有架钢琴，谁都可以弹的，本来准备练到15:00回去，可是突然楼使劲地晃了起来。”

又地震了，范泽红并没有惊慌，在这里地震是很平常的，而且3月9日发生过一起7.2级的地震，“大家并没在意，以为像上次那样晃个十几秒就没事了，可是这次有点不一样，一晃晃个不

停，而且越来越强烈。”

一楼跑出去很容易，出门后范泽红就看到旁边一幢家属楼水管爆裂了，水哗哗地往下流，很可怕，而且天气非常不好，风呼呼地吹着，“一个住4楼的女生，也是中国人，抱着电脑哭着跑了出来。”

大楼里奔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不知道震级有多大，感觉晃了足足三四分钟大楼才停止摇摆，一位美国女孩攥着i-phone4，居然可以上网，她查询后告诉大家发生海啸了，仙台机场没了。范泽红说，意识到了严重性，不震的时间里，中国很多留学生就挤在大厅门口，“日本学生比较淡定，他们坐在里面。余震一来，我们就往外跑，不震了，又回来，就这样重复了几次，后来，我们发现，日本建筑真的很坚固，也就跟日本学生一样呆在房间里了。”

通讯断了，范泽红一直跟爸爸妈妈联系不上。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雪，黑蒙蒙的天一下子变得白亮亮的。

对面的三条中学有个避难所，免费提供水和食物，范泽红就和一个美国女孩过去了，地方很小但人很多，大概有1000多人，“提供的食物并不多，米饭、海带、紫菜类的，带一点点咸味，只有500份左右，而且冰天冷冷冷的……美国女孩带了一些面包，巧克力等，我俩就吃这些了。”

范泽红说，学校宿舍里提供的要好一点，大厅里放了罐装饼干，学生们可以随便拿，多少都可以。

下午5点，范泽红通过同学的手机上了QQ，给妈妈的QQ迅速发出“好的，没电”。就怕信号中断，不敢多打字，而且还有很多同学等着报平安，“我爸妈收到了，可是后来才知道我妈收到信息后还是一直哭，她不甘心。”

晚上，范泽红没回宿舍，避难所里没电也没暖气，用一些蜡烛照明，“真的很冷，冻了一晚上，衣服也乱穿着，羽绒服外面还套着棉睡衣，裤子也这样，可还是冷。”

同在一个学校就读的王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四赴日交换生），地震来临时，他正在东北大学青岚山的研究生楼里看论文，他和同学们也

非常淡定，戴好头盔，躲在桌子底下，“可是越晃越厉害，大家才开始往外撤，外面就有一个空旷的网球场。”

没有人跑，王祺说让他最感动的是日本教授都是确定所有学生离开教室时，才走出来，“我的日本教授桑野博喜也一样，最后一个走出大楼，50多岁了，非常从容。”

“青夜山避难所，吃得还可以，提供矿泉水、速热饭及鱼罐头、压缩饼干等。”王祺回忆，晚上避难所里还调来6-7个灯油炉取暖，女生和孩子们都发了一条毛毯，我是回宿舍把毯子抱过来的。”

日本上空 6分钟，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3月11日14点，仙台机场，在日本东北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晓斌请假回国，可是他的航班CA924延误了。

没有任何预兆，14:40，他乘坐的飞机起飞了，晚了15分钟。

14:46，日本发生9级特大地震，随后，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了仙台机场，一片汪洋。

6分钟，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可是梁晓斌并不知道。

当天17点左右，CA924降落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第二个走出机场出口的他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红肿着双眼在等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扑上来紧紧地抱住他，直到知道发生了什么时，梁晓斌顿觉一阵凉意，“如果当时飞机没有起飞或者正在起飞，恐怕都无法幸免，最好的设想就是被困在二楼的候机大厅，但在飞机上的我们没有机会逃生。”

梁晓斌说，当时飞机上大概有50多个人，“我们都是幸运儿。”说起飞机上的事，他说真的什么感觉也没有：“当天阴天，起飞之前还下过小雪，起飞后五六分钟就进入云层了，我都没往外看，我啥消息都不知道。”

回过神来，梁晓斌开始死命拨打电话，可是电话一直不通，仙台的同学们怎么样，担心占据了他整个心。刚进家门，他就打开电脑试图用网络联系，可依旧没有任何回音。有一位朋友到家的大姐，电话只通了一声就断了。



3月19日，大量旅客聚集在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等待出境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 摄

3月11日-3月20日 无论多么困难，生活还是要继续

从来没见过这么庞大、沉默的人流

都说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震来临，“一衣带水”变成了无缝连接。家有儿女在日本工作、读书的中国人心急如焚，他们着急地侍亲人的“平安电话”。但是那天下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收到日本来电。

和在仙台的范泽红一样，几乎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都是通过网络向国内报平安的。“手机没信号，我是通过发邮件，向父母报平安的。”东京大学的陶然说，可能是为了保证跟救灾有关的通话，私人电话都被切掉了。网友“顶级坏蛋”不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来自内蒙古的他在日本的一家卖酒的商店打工，他也是通过网络和家里取得联系。他那天休息，他说他甚至是通过自己所在的“魔兽群”才知道出了大事的，上网前，他并不知道震得这么厉害。“我是用网上SKYPE打的电话，网络一切正常。”来自南京的留学生小李说。

不仅是电话不通，3月11日地震过后，和电有关的电车（地铁、有轨电车）的营运也变得不正常。东京交通四通八达，十分便捷，而电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电车的暂时停运，使得东京的交通变得十分拥挤。“很多人都改乘公交。”在日本生活了近12年的崔光哲对东京十分熟悉，他说虽然增加了公交的车次，但还是供不应求。

这样，3月11日傍晚和夜里，在东京，更多的人选择了步行下班回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庞大、沉默的人流。”崔光哲说，在东京的路面上，你能看到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前进的人群，虽然不能说这是“动人的一幕”，但是，联系到刚刚发生不久的地震，以及他们刚刚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汹涌的海啸冲毁、吞没的房屋，这一幕非同寻常。

而东京大学的老师也提醒学生地铁不正常，希望大家做好在学校过夜的准备。但是那天夜里陶然还是坐地铁回了家。地铁是夜里11点恢复营运的，可以想象地铁拥挤的程度。不仅如此，因为供电不正常，也由于余震的缘故，地铁开开停停。等陶然回到家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1点半了。地震前，陶然从家里到学校上课，只需一个小时，这次用时多得多。

核威胁让回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主旋律

3月16日，周三，忙碌的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场候机室里满是等待回国的外国人，其中包括欧美人和中国人。来自东京大学的陶然是其中的一位。

地震发生后，陶然宅在家里，通过电视、网络看新闻，了解地震的最新动态。虽然交通变得拥挤，超市里一些食品紧缺，一些地方限电，第二天，也就是3月12日，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组发生了爆炸，但是整个东京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东京人也表现得很淡定，照常上下班。生活还是在继续，陶然心里也很平静。

但是，在东京以外，在日本以外，人们的心里似乎比生活在日本的人还要脆弱。“星期天（3月13日）家里来电话让我赶快回家，说反正是放春假，正好可以回家躲避。”陶然说父母主要是担心核辐射，其实东京还好，核电站的风向一直都是朝东，吹不到东京。他犹豫着回不回去，但经不住家里不断要求，周一（3月14日），他在网上购买了周四（3月17日）日本航空公司回上海的机票。但是周二（3月15日）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号机组发生的爆炸，使得陶然加快了回国的行程。他在这一天改签了周三（3月16日）的票。“这个时候票已经紧张了，经济舱已经卖完了，我只好买了商务舱。”

3月18日，已经回到南京的陶然，对快报记者说，“机场候机室全是外国人，怕第二天早晨赶不上飞机，我前一天晚上就进了候机室，在里面凑合了一晚。”

像陶然这种被家里人“逼”着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现在在日本电子专门学校读书的李同学也将在3月20日乘飞机回到南京。

而像崔光哲这样在日本有着良好工作的人，大都选择留在日本，“一是放不下工作，二是我觉得情况还没到要撤离的程度。”但是崔光哲还是决定下周把孩子送回国，“孩子太小，一个5岁，一个才7个月大，送回去安心些。”

不单只是中国人有回家的愿望，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已经动员在日的本国国

人尽快回国。“法国大使馆在网站上发布了撤侨的消息。”陶然说。

从容、淡定的日本人 地震后生活还是在继续

大地震发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电视、网络，看到了地震特别是海啸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灾难，画面触目惊心。除此之外，人们也借此了解，甚至重新认识了日本人。无论是电视台的主播、出境记者，还是日本的普通市民，面对巨大的灾难，表现得格外从容和淡定。

“日本的电视报道得特别专业，刚开始几天，每天都轮番播放着海啸、核泄漏、断电的消息，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信息。”陶然介绍说在日本人们主要通过电视了解地震最新的情况。

而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日本普通民众在灾后的表现：断电了，地铁、有轨电车暂时停运，时断时续，他们就坐公交、骑自行车、步行上下班；也因为断电的缘故，超市的一些食品和饮用水出现了短缺现象，他们并不慌乱，而是安静地在超市排起长队；政府和媒体呼吁民众给灾区捐款，他们默默地通过ATM机往指定的账号打款；政府要求节电，商家主动关闭了货架上的灯，停用了电动扶梯转门……

日本以外的人对日本民众的素质赞不绝口，而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表示了肯定。“理智”、“从容”、“守纪律”，但稍许“冷漠”，与此同时，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这与日本的国民性有关，所谓素质绝不会一蹴而就。

“团队精神，忍耐力，两者都很强。”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她对日本民众的特点印象很深。

接二连三的核泄漏 考验日本，也警示世界

此次日本大地震给日本带来了巨大损失，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一个复合性的灾难，不仅是地震，还伴随着巨大的海啸，而且致使日本的核电站受损，核辐射物质泄漏。当地海啸的救援告一段落后，核泄漏越来越成为目前以及以后人

们关注的焦点。

当3月12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爆炸后，日本政府和相关单位，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了相关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表示：“（核电站）没有向外释放大量的辐射。我们希望所有人平静地对待此事。”然而就在次日，福岛第一核电站便传出有160人受到核辐射的消息。

自核泄漏以来，政府对公众传达的信息始终是一种乐观的情绪：有关单位正在全力处置核泄漏；虽然在东京等地检测到辐射量超出正常标准，但这样的辐射量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可是事实与政府的乐观期许并不一致，“爆炸性事故”接连发生——3月12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爆炸后释放大量核辐射物质。3月14日，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发生氢爆炸。3月15日，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附近传来爆炸声。福岛2号机组反应堆安全壳受损，面临放射物泄漏威胁。福岛4号机组发生爆炸。3月16日，福岛第一核电站4号机组再次发生火情。3号机组发生了爆炸。3月18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提高为5级。

这种反差让日本的媒体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产生了质疑，甚至怀疑政府和相关部门有隐瞒实际信息的嫌疑。

“IAEA秘书长天野在日本记者俱乐部说：今晚起，IAEA将独自观测东京都内的核辐射。不信任日本政府公布的信息。”从李淼在3月18日发布的微博，可以看见一种不信任的情绪正在扩散。“菅直人政府的情信度不到20%。”李淼对快报记者说。

而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3月17日在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甚至对日本发展核能提出了猛烈的抨击：“经历过核爆烈焰的日本人本就不该从产业效率的角度看待核能。总之不该把它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来追求。”

在大江健三郎看来，“这次事故已经证明，核电是多么的无差别（杀伤），重复这样的错误是对广岛死难者记忆最恶劣的背叛。”

»超声波

在灾难中思考“人”的方向

今天，3月20日，日本9级强震已是第10天。7千多人死亡，1万多人失踪，近40万人加入避难队伍，50多万人受灾，福岛核电站半径30公里内的居民被疏散，包括东京在内的广大地域内居民生活受到直接影响。地震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全球经济也增加了变化因素。然而，相比于生命遭受的威胁，经济影响已经不是特别重要的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世界站在一起。

这是世界人民的灾难，日本的灾难，也是日本的灾难，人类的灾难。地震和海啸，便作为生物种群的人类的生存迅速成为思考的主题。如同卷走十几万条生命的印度洋海啸，如同造成6万多人死难的汶川地震，这些令人惊异的灾难，使一切其他价值在生命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全球化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正在带来思维的革命。思想家的概念设定，越来越少地划分割，“中国哲学”变成“哲学在中国”，“东方艺术”变成“艺术在东方”。类似的，“中国人”、“日本人”的概念，应当替换为“人类在中国”、“人类在日本”。这不只是思维的变化，也是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在地理分布上的现实。

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大气污染、洪水泛滥、土地荒漠化、气候变暖、风暴、地震、海啸、生物灭绝、疫病、饥饿，以及恐怖主义，都不是国家边境可以阻隔开来的，“全球治理”以地球为思考单位而出现。

一个国家的灾难，本身就是人类灾难的一部分。经济的全球联系使一个国家开始的衰退可能成为世界衰退的起点。今日人类的足迹穿梭往来，利比亚危机中国需要撤侨数万，日本强震发生时超过2万中国人在受灾地区生活或旅游。而现代文明的思维还超过“国民海外救助”，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无论发生在何处，都应当受到国际救助。

文明与野蛮、蒙昧的分野，不在力量的强弱，而在于更能体现生命的本质意义。那些能够显示生命意义的价值得以产生、坚持和扩大，这就是文明进程，反之则谓之倒退。人类的暴虐行为史不绝书，仇恨、争战、屠杀、灭绝，都曾有之，而文明之所以能够得以前进，不是在野蛮中复制野蛮，而是如同在自然灾害面前哀伤并沉思一样，为人类的野蛮而哀伤，并从野蛮中沉思，找到“人”的方向、文明的方向。

人类已经可以飞向天空，并超越大气层，但仍不能够超越地球，也未曾到达地心。人类已经有能力改变物种、复制自身，但仍然未能解密心灵。地震发生在东边或者那里，经纬度偏向这边儿，那边儿的人，对地球来说有什么不同呢，那灾难人群就不一样了，灾难者可以说是替生者而死。人类已经可以利用核能，但仍然未能拥有遏制其破坏性后果的手段。由地震次生的核电站泄漏，使人们知道当自己行动时，有能力深刻地改变世界和自己，却未必具有终止不良后果的能力。

地震在刹那间将“万物之灵长”仿佛逐回普通生物，但相互慰藉与救助仍足以使幸存者不至于如动物一般在恐慌中独自奔逃。自然必须接受，但生命在灾难面前不是无所作为。人类拥有的一切，一部分是使心灵避免落入荒芜，一部分是使生命避免流落荒原。怀揣理想，使一切生命在相互依存中发展，这就是“人”的方向。

刘洪波